

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主 编
白云翔 李小宁 胡继根



2013年12月

封面设计 卜早
责任印制 张丽
责任校对 赵宁
责任编辑 张昌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5010 - 3944 - 9

I. ①秦… II. ①中… ②浙… III. ①墓葬 (考古) - 中国 - 秦汉时代 - 文集 IV. ①K878.8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3000 号

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14.5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944 - 9 定价: 126.00 元

本论文集由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资助出版

目 录

前 言	白云翔 李小宁(1)
“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致辞	白云翔(4)
“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 纪要	游晓蕾(6)
商周两汉的土墩墓	施劲松(12)
汉代土墩墓的发现与研究	陈 超(23)
汉代土墩墓分区和传播浅识	刘兴林(33)
浙江“汉代土墩墓”的发掘与认识	胡继根(44)
安吉古城及上马山汉墓群的调查与发掘	田正标 游晓蕾(52)
试谈浙江长兴地区秦汉时期土墩遗存的堆积成因 ——以长兴夏家庙土墩墓为例	孟国平(58)
长兴县秦汉土冢遗存概要	梁亦建(63)
论浙江汉代土墩遗存中的“越地”因素	李晖达(71)
汉代土墩墓的社会经济背景考察 ——以湖州杨家埠汉代土墩墓群为例	程厚敏(77)
汉代土墩遗存为家族茔地论 ——以浙江汉代土墩遗存为例	刘建安(84)
苏州地区汉代“土墩墓”的两点观察	徐良高 唐锦琼(91)
湖南常德南坪汉代土墩墓	龙朝彬(97)
孤例化流 ——常德土墩墓的时代及其他	刘 瑞(109)
山东沿海地区汉代墩式封土墓有关问题探讨	郑同修(116)
滇东八塔台文化墓地的特征和年代及相关问题	杨 勇(129)
东北亚坟丘墓（土墩墓）构造的比较	林永珍(143)

关于中日古代坟丘墓起源的研究现状	刘振东(151)
日本周沟墓的形成	中村大介 (张成翻译) (164)
韩国东南部地域三国时代封土古坟筑造手法研究	辛勇旻 赵明来(177)
西汉诸侯王陵陪葬墓封土、墓域略论 ——以大云山江都王陵陪葬墓为例	李则斌(183)
关于长江中上游地区汉墓出土江东类型陶瓷器的初步考察	杨哲峰(189)
后记	(210)
彩色图版	

前　言

在《秦汉土墩墓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出版之际，这里就这次学术会议的召开和论文集的编辑出版等做简要说明。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是在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推进和逐步深化的，都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创新的过程。这就需要科学工作者时刻注意新问题，不断提出新问题，深入研究新问题。考古学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考古学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即考古学研究中的新问题，往往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提出和展开研究的。因为，“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同考古发现相伴随的”。秦汉土墩墓这一课题，正是在我国田野考古广泛开展、秦汉时期的土墩墓类遗存不断发现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

长期以来，“土墩墓”一般是指在地表之上安放死者和随葬器物进行平地掩埋而形成土墩的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其基本内涵在于：有坟丘而无墓穴，利用丘陵地带的山冈或平原上的高地，在地面上安放死者和随葬器物平地掩埋，然后堆土而形成土墩；或一墩一墓，或一墩多墓，而太湖和杭州湾一带还发现有土墩石室墓；随葬品主要有陶器、几何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少数土墩墓还随葬有青铜器；主要分布区域是在苏南、皖南、浙江、上海以及闽浙赣交界地区；各地的土墩墓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并且其年代也有早晚之别，但其年代总体上相当于夏商之际至战国前期，约当公元前2千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其文化属性，一般认为是吴越文化所共有的一种葬俗。由于其年代大致是商周时期，其分布地区主要是江南地区，因此，长期以来“土墩墓”成为“商周时期江南土墩墓”的简称或代名词，也有学者称之为“商周土墩墓”。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安徽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湖南北部沅江下游地区等地，先后发掘了一批类似商周土墩墓的秦汉时期墓葬。它们或在平地或在岗地（为数较少）上堆筑土墩，有的则是利用天然岗地或先秦时期的土墩，然后在土墩中挖建墓坑安放死者及随葬品进行埋葬。它们与江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土墩墓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它们具有鲜明的秦汉时期墓葬的某些时代特点，但与已知秦汉时期墓葬常见的类型又有明显的差异。很显然，这种墓葬是新发现的一种秦汉时期的新的墓葬类型，并且与商周土墩墓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何看待各地发现的这种新的墓葬类型或类似的文化遗存，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墓葬类型及其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及其意义，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新课题。面对这样一个新的课题，首先是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系统的资料整理，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深入的学术探讨已经是势在必然，并且学术条

件已经基本成熟。

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之下，为了深化对秦汉时期土墩墓类遗存的研究以及各地之间类似遗存的异同和联系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领导经过友好协商，决定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就秦汉以及商周时期的土墩墓类遗存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2012年11月5日~8日，在浙江省安吉县和长兴县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安吉举行，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有关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详见《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8日第2版的报道和本文集收录的《纪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主题突出，交流广泛，讨论深入，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这次会议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大会发言、实地考察和集中讨论的有机结合与互动。在大会发言中，与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地土墩墓以及其他相关遗存的考古新发现，交流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新成果。在长兴县参观为配合这次会议专门举办的《起于累土——土台·土墩·土冢》文物展览、观摩长兴县夏家庙土墩墓发掘出土遗物以及实地考察安吉县安吉古城遗址、龙山土墩墓群和上马山汉代土墩墓考古发掘工地等的过程中，与会代表带着问题看，对着实物议，从文化属性、墓葬结构及其营建方法和过程到随葬品、丧葬习俗等，边看边比较、边看边讨论，就相关问题充分交换了看法，进一步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充分的学术民主和真正的“百家争鸣”。这不仅体现在大会发言和实地考察过程中的充分发表意见和广泛交换看法，更体现在会议集中讨论过程中的各抒己见，热烈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交锋。譬如，关于秦汉时期土墩墓的命名和性质、各地的土墩墓类遗存是否可以视作同一类遗存、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秦汉土墩墓与商周土墩墓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土墩墓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有关墓葬类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文化上的联系等，与会代表都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并且展开了平等、友好而又激烈的争论甚至是辩论。真可谓“百家争鸣”，十分难得、十分可喜。关于上述问题的各种意见和认识，本文集收录的论文中多有更系统的论证和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就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而言，与其说是解决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共识，不如说是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引发大家进一步关注这些问题。因为，在学术发展的进程中，提出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面对土墩墓这种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新的墓葬类型，大家的认识各有不同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墓葬类型是一种新的发现，并且大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所以采取某种形式进行交流和讨论，就愈发显示出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会议及其成果，必将引起考古学界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更进一步深入地开展研究，尤其是对今后秦汉时期墓葬的田野考古，更是具有直接的引导作用。

为了更广泛地展示和交流国内外学者关于秦汉土墩墓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研究和

前 言

认识，使之在今后的土墩墓研究、秦汉考古研究以及东亚各地文化交流研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也是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一种文献记录，我们编辑了这部会议论文集。我们衷心地期待着，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对秦汉土墩墓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乃至秦汉考古学的发展，有所裨益、有所推动。

白云翔 李小宁

2013年9月

“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深秋时节，“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丽的浙北安吉开幕了。我谨代表主办这次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百忙之中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领导和各位代表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众所周知，土墩墓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墓葬类型，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土墩墓”，大家似乎均指向江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土墩墓，但我们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秦汉土墩墓”。那么，为什么提出秦汉土墩墓的问题呢？为什么以秦汉土墩墓为题召开这次讨论会呢？

先秦时期，我国江南地区流行一种利用丘陵地带的山冈或平原上的高地、在地面之上或挖建浅坑安放死者并随葬器物进行掩埋而形成土墩的埋葬形式，考古界称之为“土墩墓”。同时，由于其流行年代主要是商周时期，所以又常称之为“商周土墩墓”。但是进入秦汉时期，这种埋葬形式似乎突然消失了。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是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湖州杨家埠、安吉良朋镇等地发掘一批两汉时期在平地或少量在岗地上堆筑土墩、有的利用先秦时期土墩或天然岗地、然后在土墩中挖建墓坑安放死者及随葬品进行埋葬的墓葬。它们与江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土墩墓既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新发现的一种秦汉时期的墓葬类型。新世纪以来，类似的汉代墓葬除了在杭嘉湖地区继续大量被发掘外，在安徽省东南部的广德一带、山东省东南沿海地区的日照海曲和胶州赵家庄、湖南北部沅江下游地区的常德南坪等地也有不少发现。实际上，1977年～2001年间地处滇东高原的曲靖八塔台、横大路、平坡等地发掘的墓葬，其墓葬结构也与杭嘉湖地区的汉代土墩墓相同或相似。这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譬如，这种墓葬作为秦汉时期某些地区存在的一种墓葬类型，其基本特征是什么？应当怎样定性、定名？是否还包括并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类型？各地之间有什么异同？秦汉时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在整个秦汉时期的丧葬文化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它们跟江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土墩墓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应当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联系？各地秦汉时期的这种墓葬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进而而言之，我国秦汉时期的这种墓葬，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的“坟丘墓”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应当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各地秦汉时期的土墩墓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那么，它们所反映的是人群的移动还是文化上的传播？因为，墓葬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遗存，它所表现的并不仅仅在于墓葬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所蕴藏的人、人的活动、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信息。因此，秦汉土墩墓的研究不仅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和理论意义。

在这一系列新的发现和新的问题面前，田野考古发掘和资料的整理是基础性工作，应当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强化；以考古发掘为基础的各种专题研究同样重要，目前正在逐步展开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秦汉土墩墓为主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秦汉土墩墓的发掘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考古资料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积累，有关的考古发掘报告正在陆续出版，各地的学者也正在就有关问题进行梳理和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秦汉土墩墓进行专题学术研讨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并且为学术界所期盼，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会议的召开是非常及时的。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浙江省的安吉和长兴，作为秦汉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区，20 多年来秦汉土墩墓已发掘数百座，并且类型多样，资料丰富，研究基础好，具有秦汉土墩墓研究的独特优势，在这里进行秦汉土墩墓的专题研讨可以说独具“地利”。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以及秦汉土墩墓发现和研究的历史、现状及趋势，有关方面商定在安吉和长兴召开一次有关秦汉土墩墓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邀请北京、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湖南、云南等地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就秦汉土墩墓及相关问题进行专题交流和研讨。很显然，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重要，而且非常必要和及时。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直接的交流、实地的考察和深入的研讨，必将进一步促进和深化秦汉土墩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其历史和文化意义的阐释和认识，对于秦汉考古学和秦汉史学研究的发展，对于秦汉土墩墓遗存的科学保护和展示以及当地的文化建设事业等，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2012 年 11 月 5 日下午 · 浙江安吉

“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游晓蕾

“土墩墓”一般认为是商周时期流行于江南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墓葬类型，封土成墩，其随葬品以印纹陶和原始瓷为基本组合，并伴出有少量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安徽广德地区、山东东南沿海地区、湖南沅江下游地区、江苏南部地区陆续发现和发掘了一批两汉时期的类似土墩墓的遗存，这些遗存具有先堆土筑墩，再挖坑埋墓和以高温釉陶为主要随葬品的共同特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思考。

为了深化对秦汉时期类似土墩墓遗存的认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安吉县博物馆、长兴县博物馆协办的“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5日至8日在浙江省安吉县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湖南、广东等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以及韩国和日本等国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于11月5日下午举行，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小宁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吴志强、安吉县委副书记陆为民等先后讲话致辞。11月6日和8日，与会代表就秦汉土墩墓遗存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会议发言和专题讨论。

一

与会代表在会议发言中介绍了浙江、安徽、山东、湖南、云南等地发现的秦汉土墩墓遗存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白云翔首先回顾了土墩墓和秦汉时期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的历史，提出秦汉土墩墓遗存的命名、性质、各地之间的异同和联系、与先秦土墩墓的关系等都有待于深入探讨。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同修介绍了山东东南沿海地区发掘的带有封土的中小型汉代墓葬，其共同特点是在一个封土之中有多座墓葬，年代从西汉早期至魏晋时期，形制及随葬品的组合与特征体现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影响，目前发现仅限于沿海一线。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峰介绍了安徽广德南塘汉代土墩墓墓地的发掘情况。墓葬形制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土坑墓主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砖室墓一般为东汉。墩内墓葬分布集中而整齐，打破关系少，推测埋葬前作过规划。整个墓地可以分成若干个小区，推

测每个小区为一个家族。

常德市博物馆龙朝彬介绍了湖南常德南坪土墩墓的发掘情况。土墩墓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先平整修建排水沟，然后堆筑熟土台并预留墓坑，用青膏泥修建标志墙，接着埋墓修整墓口、墓道和排水沟，形成一个由排水沟环绕土墩的封闭的墓地。根据墓内随葬的印章可知一个墩为一个家族墓地，时代大致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介绍了滇东八塔台文化墓地。墓地为大型土堆，由早、晚不同时期的墓葬累叠埋葬而成，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圹，规模较小，随葬品有显著的地方特点。根据出土器物及墓葬埋葬过程，推断八塔台文化墓葬年代以西汉为主，上限或至战国晚期，下限则可至东汉早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正标介绍了安吉古城遗址和上马山墓地的情况。古城城址平面近方形，边长 550~600 米，四周有土筑城墙及护城河，始筑于战国，延续至汉晋，城址外围有窑山、山墩遗址以及龙山、笔架山、上马山等墓群。上马山墓地主体为战国晚期至汉代的土墩状墓葬，按照埋葬方式和随葬品组合的不同可分为楚式墓和汉式墓两大类。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国平以长兴夏家庙发掘的土墩为例，归纳了秦汉土墩墓的五种堆积过程。第一种为在地表直接挖坑埋墓封土成墩，再在土墩上挖坑埋墓封土；第二种为在商周土墩上挖坑埋墓封土；第三种为在商周土墩旁挖坑埋墓封土，与其合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土墩；第四种为在一条山岗上若干小土墩间挖坑埋墓封土，合成一个规模更大的土墩；第五种为先堆筑一个土墩，再在墩上挖坑埋墓封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对比了商周和汉代的土墩墓，认为二者的营建过程和主要特点基本相同，都反映了防潮和聚族而葬的丧葬观念。土墩墓没有共同的随葬品，不具备标识某种考古学文化或某个古代族属等方面的意义。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李则斌介绍了大云山西汉王墓和陪葬墓，墓上均有封土。江淮地区西汉时期的中小型土坑木椁墓一般不见封土，说明西汉时期一般官吏、中小地主、平民的墓葬不封不树，而王、侯及其家族、重臣的墓葬经过周密的规划，有封土和墓域。

韩国东亚西亚文化财研究院辛勇旻、赵明来介绍了韩国东南部三国时代封土古坟的三种建造手法：1. 积石木椁坟为平地建造木椁后填埋石块建筑封土；2. 封土石椁（室）坟为在地表下挖墓室构筑竖穴式石椁（室）后建筑封土；3. 土台石椁（室）坟为在堆筑好的土台上挖坑构筑竖穴式石椁（室）后在上部建筑封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继根归纳了汉代土墩墓的堆筑过程和土墩类型，并认为汉六朝土墩墓的存在是江南湿地类型丧葬习俗的传承和发展，各地发现的汉代土墩墓在墓地的营建方式、随葬品质地和种类方面有较大的共性，应是同一族群所为。日、韩坟丘墓与浙江汉代的土墩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探讨了商周至秦代祭祀坑与陪葬坑，汉代墓葬对早期土墩的再利用现象，以及两周时期一墩多墓现象与汉代家族墓地，提出如果汉代墓地能认定为家族墓地，两周时期一墩多墓也应该属于家族墓地。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林永珍对中国吴越地区的土墩墓、韩国马韩·百济地区的坟丘墓和

日本弥生·古坟时代的坟丘墓进行比较分析，三者围绕黄海分布，构造相似，年代相承接，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联系，中国吴越地区土墩墓年代最早，韩国和日本的坟丘墓可能受其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杨楠介绍了北美东部地区的史前土墩遗存，主要分布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由不同文化或传统的土著美洲人创造，包括墓葬墩、庙宇墩、形象墩等。墓葬墩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墩内常见建筑遗迹；庙宇墩与酋长等上层人物有关；形象墩多具原始宗教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刘振东梳理了中国和日本古代坟丘墓起源的研究现状，认为春秋中晚期江南土墩墓在地表挖掘墓坑是受北方竖穴土坑墓的影响。中、日两国同时期坟丘墓差异巨大，中国没有对日本坟丘墓产生直接的影响。

北京大学杨哲峰根据考古发现，考察了汉代江东类型陶瓷产品的流传及其影响。该产品的流传是以向北推进，以邻近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江东类型陶瓷器的部分器物造型及装饰特征被模仿，通常在模仿中还会出现质地的转换。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上野祥史论述了日本列岛弥生时代的坟丘墓及其葬制演变与特征。各有特色的坟丘墓的出现，象征着广阔范围的文化圈的成立。在坟丘墓葬制的形成过程中，东汉或曹魏的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京大学刘兴林把土墩形式的汉墓分为浙北苏南区、鲁东南区和湘北区，并认为西周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的土墩墓可能由崧泽、良渚文化的高台墓地发展而来。通过对墓葬断代的细致梳理辨识出战国中期到西汉早期的墓葬。西汉中期，山东出现了土墩墓，由鲁东南沿海向北，最后可能到达朝鲜半岛。

湖州市博物馆程厚敏以湖州杨家埠汉代土墩墓群为例，考察了汉代土墩墓的社会经济背景。杨家埠汉代土墩墓群多种文化因素共存，应该是汉代基层社会的公共墓地；各墩内均有早晚不同的墓葬，是带有强烈地域风格的平民家族墓葬群。在土台上筑墓是为了防潮和散水，并形成了风俗。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晖达论述了浙江汉代土墩遗存的文化属性，把浙江汉代土墩分为三式：Ⅰ式利用先秦土墩，继承了先秦越地文化；Ⅱ式汉代自筑土墩，汉化深，保留少量越文化的因素；Ⅲ式汉代大型自筑土墩，堆筑方式与Ⅱ式不同，部分墓葬体现了楚文化的风格，为汉代上层社会。

日本埼玉大学中村大介介绍了公元前5~4世纪日本近畿地区的周沟墓，挖好埋葬设施后再筑坟丘，埋葬设施高于当时地表高。周沟墓随葬品少，同一坟丘设置多个埋葬设施，埋葬设施越多坟丘越大，表明当时还处于各宗族集团间相互竞争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刘瑞在秦汉华南背景下分析常德土墩墓，认为后世帝王陵墓的垫高现象是土墩墓的流变。根据文献推断D3最早墓葬的年代不一定能早到公元前119~前104年的武帝时期。并认为从目前发现的出土器物看，还不能判定这些土墩墓的来源。

二

专题讨论由白云翔、李小宁主持，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研讨。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秦汉土墩墓”这类遗存的界定、命名、性质、与先秦土墩墓的关系等；（二）各地区间的差异和联系；（三）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的“坟丘墓”与中国土墩墓遗存的关系；（四）在发掘和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胡继根认为秦汉土墩墓的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品与其他汉文化墓葬一致，特别之处在于土墩是墓地的载体。土墩内的墓葬排列有序，应该为家族墓地，常德南坪土墩墓出土的印章亦证实了这一点，建议可命名为“土墩式墓地”。帝王陵墓与土墩墓的垫高目的不同。目前各地发现的秦汉土墩墓遗存有一定的联系，共性大于差异，各地有所差别，但尚未能划分出区域类型。总结多年发掘经验提出，探方法不易排水，十字隔梁不易控制较大土墩，采用多隔梁发掘较为合适。

郑同修提出堆筑土墩墓并非为了防水，墓葬上的封土体现了封土的理念。山东与浙江发现秦汉土墩墓遗存总体共性大于差异，但山东出土高温釉陶的墓葬年代在武帝之后，晚于浙江。发掘方法可以因地制宜，符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即可。

龙朝彬认为命名为“秦汉土墩墓”简单明了，包涵了主要特征。堆筑土台再挖墓是一种风俗，而不是为了防潮。根据常德土墩墓出土的印章等随葬器物，土墩墓是家族墓地。

李则斌认为可以扩大商周土墩墓的时间和范围，把秦汉甚至年代更晚的遗存包括进来，统一称为“土墩墓”。土墩墓是吴越民族根深蒂固的行为，是公共墓地，而不是家族墓地。各地出土的高温釉陶器与越人的迁徙有关。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成林认为土墩墓的特征在于堆筑土台而非封土，土墩墓有一部分是家族墓地，大部分是公共墓地。

施劲松认为土墩墓是为了掩埋死者而在土墩内埋设墓葬，从墓葬结构、形态、主要特征及其反映的丧葬观念来看，秦汉土墩墓与商周土墩墓都属于土墩墓范畴，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赞成用“土墩墓”命名。

刘瑞提出先平整土地堆筑土台，然后在土台下挖墓葬，最后封土，按这个过程来说，实际上帝陵和诸侯王陵里很多也是土墩墓。土墩墓可能就是家族墓地，一个家族姓氏不一定相同。湖南出现土墩墓应与人口流动有关。

德清县博物馆朱建明认为利用自然的台或比它早的墓葬所形成的台再挖坑筑墓，墓坑深，随葬高温釉陶器，与商周土墩墓是有区别的，可以命名为“秦汉台坑墓”，采用这样的埋葬方式应该与当时的土地使用制度有关，可能是为了节约土地。

安吉县博物馆程亦胜提出商周土墩墓大都有浅坑，战国晚期以后，随着楚文化的介入，墓坑变深，但都属于土墩墓范畴，可以按照年代划分，称为“秦汉土墩墓”。

刘振东认为江南地区商周土墩墓选址主要位于丘陵和山岗，形制为平底掩埋，棺椁痕

迹不明显，封土结构为堆筑，北方春秋末期开始出现的坟丘墓基本位于较平坦的地方，深挖墓坑，棺椁制度发达，夯筑封土。秦汉土墩墓的选址、形制、棺椁、封土特征是北方墓葬的要素，是北方墓制为适应南方地理特点产生的变化，可以命名为“台坑墓”或“群集墓”。

刘兴林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北方带封土的墓葬并不普遍，一墩多墓是秦汉土墩墓的重要特征之一，南方地区的土墩墓有延续性，按时代命名容易割裂其延续性。

杨楠认为由于楚文化的强势介入，江南地区商周土墩墓的随葬品，埋葬方式，棺椁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封土成墩的形式给后代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建议秦汉土墩遗存可以称为“坟丘墓”。一墩多墓有的可能是家族墓地，有的可能不是。

牟永抗认为墓葬保留了古人们对死亡认知的丰富信息，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不同人群，都有一定的生死观念。营建高台地是对南方湿地环境的一种适应。高温釉陶器与秦汉土墩墓相始终，体现了阶段性特征。

杨勇认为秦汉时期的土墩墓和北方的封土墓有所区别，土墩墓土墩是载体，墓葬埋在墩里，封土墓封土是墓的组成部分。八塔台文化墓葬与其他地方的秦汉土墩墓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背后反映的观念值得关注。

辛勇旻认为土墩墓的主要特征是当时的生死观念，建筑土墩的理由。土台是土著文化的特征之一，封土是北方中原文化特征，土墩墓是海洋性文化，韩国的封土、坟丘是从中国大陆传播过去的。

林永珍认为韩国坟丘墓与中国土墩墓有关，此次会议讨论的秦汉土墩墓，缩短了吴越土墩墓与马韩坟丘墓的时空差距，但由于两地墓葬的建筑方式、出土器物有很大差异，二者之间的联系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村大介认为日本的周沟墓与汉代土墩墓有相似之处，但没有发现有直接的关系。

田正标认为商周土墩墓多位于较高的山脊上，平地向上起建，秦汉土墩墓遗存多位于岗地，向下挖掘墓坑打破生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反映了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二者存在一定的传承，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丧葬观念，秦汉土墩墓遗存不属于土墩墓范畴。

上野祥史提出要了解汉代人关注的是坟还是墓，哪一个更重要，南北方墓葬的社会功能是否一致，在关注封土、土墩的同时也要关注内部墓葬的结构。

西北大学段清波认为秦汉土墩墓与史前土台、商周土墩墓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虽然细节有所差异，主要是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了文化惯性。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赴长兴县博物馆参加了为配合此次会议召开而举办的《起于累土——土台·土墩·土冢》专题展览开幕式，对长兴夏家庙土墩墓出土的文物进行观摩研讨，到安吉县古城镇和良朋镇对安吉古城遗址、龙山土墩墓群、上马山汉代土墩墓考古工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参观了安吉县博物馆。

这次研讨会紧紧抓住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新情况和新动向，立足于提出问题、加强交流、促进发掘、深化研究，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交流信息和切磋学术的平台。通过此次会议，与会代表不仅对各地“秦汉土墩墓”这类遗存的发现

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在实地参观考察和讨论中拓展了视野，加深了对这类遗存的理解和认识。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引起学术界对“秦汉土墩墓”这类遗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将有助于秦汉时期这类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江南先秦土墩墓流变的认识，并且对于进一步深化秦汉时期墓葬类型和丧葬文化研究、不同地区之间人群移动和文化传播等问题的研究等，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